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发育于封建社会早期，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史哲一体的中国传统社会科学即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科学曾经产生过许多可称为文化遗产的伟大成果，这些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许多社会科学思想家已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他们的名字已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对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的理论持任何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民族、社会对社会科学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要求。进入近代社会后，科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理论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的认识世界的功能依然存在，但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在直接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功能显然更为世人关注。社会的需要导致科学理论走出科学家的书斋，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应用性成果。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社会对科学的投入有了惊人的增长。在美国，科学研究经费 1920 年为 0.8 亿，占国民生产总值 0.1%;1945 年为 152 亿,占国民生产总值 0.7%;1965 年达到 2043.9 亿,占国民生产总值 3%。与此相对应，科学研究活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要方面,成为国家管理者和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科学家不再是封闭在象牙塔中的人，他们的研究选题不再如牛顿时代那样自由,而是受到研究经费提供者的支配 同时,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已纳入社会“ 知识生产 ”的范畴中,科学的投入、产出、效率、效益等经济学指标已普遍为社会管理者使用。

科学的这一变化同样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当代社会科学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社会科学的变革是全方位展开的，但最根本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逐步确立了以理论的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尽管至今为止,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与应用效益远远不如自然科学成果，但追求其成果的社会应用依然是多数社会科学家努力的目标。即使是在牛津、剑桥这样的以经院式研究风格闻名的学院里，也开始研究英国的社会问题了。今天,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需要,不再仅仅是要社会科学家们提供充满哲理的思辨性成果,或对前人、伟人思想作深刻的考证、阐释,社会更加需要的,是能够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求他们能直面社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政策思想、决策依据,以及可行性方案。用联合国社会科学专家小组于 1979 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的话来说，“ 社会科学的主要职能是为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与方法的依据 ”[①]。现代社会科学之所以备受人们关注，与它在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过程中能够直接或间接产生效益是密不可分的。

与理论价值观念变革直接相关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由于传统社会科学存在着研究方法方面的根本缺陷,即使从事了应用研究，也很难产生可以获得重大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①陈誉:《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 ,第 7 页。

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企业、工业组织、行政管理、法律和政治都是实际的社会活动,但是这些社会活动仍远远不是应用社会科学。事实上许多门社会科学不过是把各行各业通行的实际办法,用学术文字写下来罢了。”① 只有当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思辨、议论、文献考证的圈子中走出来,引入了更为科学、更为严谨的研究方法后,社会科学才有可能适应社会对它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即使有心从事应用研究,也无法使他们的成果达到造福于社会的良好目的。

从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及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的特点是重思辨,重议论,重文章的文采,重发掘先圣先贤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轻视调查与论证方法,轻视理论的社会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的许多东西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社会科学的要求了。

历史上的社会科学在观念上、方法上落后于自然科学,是导致社会科学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不如自然科学的重要原因。当然,社会科学的落后并非仅存在于中国。在西方,历史上的社会科学同样具有鲜明的经院式研究的色彩。文艺复兴为西方学术界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而学术界的研究方法似乎更加经院化了。直到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人们才逐步看到了这种方式的严重缺陷,并开始探索社会科学的变革。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和孔德的社会学研究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现代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特征。这些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其后的经济学、社会学及其他应用性社会科学学科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① D·J·贝尔纳著,伍况甫译:《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49页。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马克思本人也是近代社会科学变革史上无可争议的最杰出人物。在研究方法方面，尽管马克思没有在理论研究中大量使用他熟悉并喜爱的数学分析的方法，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与剖析，并通过科学的分析形成自己的学说。这种研究使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面貌一新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他毕生致力于通过社会科学理论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使其学说成为社会科学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典范。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是社会科学产生社会效益的最好诠释。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社会科学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改变了这么多人的命运。马克思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1971 年,以严谨著称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多伊奇等人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列举了 1900—1965 年的 62 项“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就。其中,1900—1917 年列宁的“一党组织和革命理论”、1917—1921 年列宁的‘苏维埃型一党国家”,1929—1949 年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与政府”占据了三项。①这三项社会科学成果显著地推动了俄国与中国的社会进步,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其应用价值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就社会科学发展总体而言,二战前世界社会科学变革进展不快。19世纪 30 年代，著名科学学家贝尔纳比较了当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后认为，自然科学的发现或迟或早总能应用,而‘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发现却仅仅被看做是学术研究”。他在

① D·贝尔著,范岱年等译:《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页。

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对社会科学的压抑后悲观地认为，只要目前这种“制度存在下去，这些学科就注定要继续处于描写性、会诊性和学术性状态”①。

直到二战结束后，人类的科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科学才开始大规模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将其归纳为综合性研究、定量化研究、应用化研究三个变化②；《社会科学史》则归纳为整体化、主体化、应用化、国家化国际化四个变化③。而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变化趋势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科学应用化趋势。

社会科学应用化是社会科学界理论价值观变化的体现。当代社会科学家走出书斋，全方位地研究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大到参与国家政策研究，解决发展、和平、环境等大型社会问题，小到研究市民生活，解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检验理论的科学性，以理论的社会效益衡量理论的价值。与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是研究方法的更新。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采用定量方法是社会科学方法变革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D·贝尔在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70 年代社会科学的新进展后指出：“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或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

① D·J·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458 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等；《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8—12 页。

③ 许志峰等：《社会科学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硬’科学。”①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科学走上了艰难的变革之路。新文化运动给清末“注经”式研究以有力的冲击,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但真正改变了中国社会科学走向的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将“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清新学风带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通过“整风”运动在党内普及这种学风,使这一理论最终推动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多伊奇等人的研究报告将毛泽东的农村革命理论当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的重大社会科学成就这一事实,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性影响。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中国社会科学没能跟上二战后世界社会科学变革的大趋势。在世界社会科学朝着应用化变革的潮流中,中国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学科——比如法学、社会学等一级学科,以及许多二级学科——却出人意料地萎缩了。这些学科的萎缩存在多种原因,比如某些领导人对它们的认识不足,但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决策程序不合理,社会科学失去了参与决策的环境,因而失去了社会对它们的需求。需求环境的变化正是中国应用性社会科学萎缩的根本原因。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为了生存,都演变为以解释政策为主要功能的学科。

社会科学的应用可以分为制定政策和解释政策两种类型的应用。前者表现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应用,有可能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制定政策的研究需要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以便研究者能

① D·贝尔著,范岱年等译:《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页

作出独立的、不依附于决策者个人意愿的研究。同时它也需要科学的方法和充分的数据，使其成果也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得到实践的检验。解释政策的研究帮助人们理解政策，正确理解政策有助于政策的执行，因而解释政策同样是应用性研究。但解释政策的研究是一种被动的应用，一旦政策出现偏差，社会科学解释政策的能力越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都变成了不问政策如何制定，只管解释政策的"阐释学"。不但政治学、经济学如此，甚至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也间接地参与解释政策。发展到"文革"期间，与一批应用性学科严重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史哲学科的畸形发展。一股比清朝末年"注经热"更甚的腐朽文风统治着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用清末"注经"式研究方法不厌其烦地解释着时时变化的政策，中国社会科学被扭曲到令人厌恶的地步。

从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的 20 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1978年，中国思想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 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中国社会科学改革问题，但它引起了思想界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反思。 1979 年 3 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落后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也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

到极大的困难。'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拉开了中国社会科学改革的序幕。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管理者在罗台山召开了社会科学改革理论研究会，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改革的全面展开。1988年,《瞭望》周刊海外版发表了一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改革的文章。文章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科学改革的成就及意义，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国社会科学改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面向应用、创立新的研究领域等诸多方面。

经过20年的发展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确立了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在服务于现代化、服务于决策、服务于社会生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在理论价值取向、理论形态、研究方法、学科结构、科学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从种种'可比的方面'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大量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决策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政策思想、决策依据和可行性方案,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与方法依然存在,在某些学科或领域甚至还占有重要地位,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无疑已成为国家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成为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管理者实施科学决策的'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变革发生在'文革'结束后的特定历史时期,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是某些学科或学派的行为,也不是对'文革'期间社会科学的简单否定。从理论变革的种种特征看,中国社会科学所发生的变革，尤其是其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方面发生的变革,与二战后世界社会科学变革的大趋势是一致的。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第二节　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研究

根据现代科学学观点,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由科学理论、科学家、科学设备、科学交流和科学管理等子系统组成。在这一完整的系统中，科学交流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

与生产物质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各种劳动相比，人类科学劳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严格排斥重复产品。为避免在科学研究中重复他人劳动,保证科研的独创性,科学家必须将自己的研究起点建立在现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谈到科学劳动时说:"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① 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是避免重复劳动的基本条件。实现科学研究时的分工协作,则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科学组织方式。为达到协作和利用前人劳动的目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科学知识、科学成果以及科学信息的交流,或称为科学交流。科学交流体系是科学研究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科学家通过科学交流体系获取科学信息,以达到避免重复劳动、提高科研效率的目的。同时科学研究成果一般只有进入了科学交流体系后，才能最终得到社会的承认。

由于科学交流体系与科学研究的最终产品密切相关，通过对科学交流行为的研究,人们可以了解科学的发展趋势、学科前沿、核心作者与科学期刊的分布,以及其他许多科学特征,因此,从贝尔纳开始,科学学家就十分注意研究科学交流问题。在现代科学学研究中,特别是运用科学计量指标的研究工作中,人们更是十分注意使用科学交流指标，通过定量获取的科学交流指标,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 120 页。

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或科学活动的社会特征。例如,普赖斯通过科学图书、期刊的数量增长指标,证明了科学增长的指数增长定律(又称普赖斯定律)。

历史上落后的社会科学必然有与之对应的落后的交流方式。在社会科学学和社会科学情报学研究中,人们已经通过对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研究,发现了许多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一书引用布里顿的研究,将这种落后的交流机制概括为三点:

1. 在知识积累方面,"社会科学中似乎看不出像在(自然)科学中所能见到的那样有条不紊的过程。很难表明社会科学的进步就如同连续不断地用建筑构件进行建筑那样,第一代人都在前人的业绩的基础上继续增砖添瓦"。

2. 在研究方法方面,"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同(自然)科学类似 阐明问题,提出问题,提出假设,收集数据,作出结论。区别在于,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和问题仅仅通过实验性调查是不能得到解决和发展的……社会科学的交流方式往往类似辩论,而不是进行科学的论述"。

3. 在成果检验方面,"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和模式往往很快被推翻,但是它们却并不甘就此销声匿迹,常常改换头面地重新出现"。①

从更加具体的交流指标看,某些社会科学交流指标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也能定量地说明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例如:

——根据国际上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社会科学家使用的文献中,专著的比重远远大于期刊论文,而自然科学研究中却相

①易克信、赵国琦:《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3—4 页。

反。研究者据此得到的一般结论是：社会科学家使用较多的是“总结性知识”而不是“创造性知识”,因而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能力不如自然科学。尽管社会科学家们有许多理由为他们大量使用专著进行辩护，如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重大发现存在于专著中，这一特点决定了专著在社会科学中的特殊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科学交流体系中,期刊论文创作时间比专著短,发表速度比专著快。如果在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知识生产者在以专著形式发表其研究成果之前不能先将其成果精华以论文形式公之于众,则该体系的知识生产机制是落后的 如果在这一体系中研究成果能够以论文形式首先发表，但引用文献却仍然是重专著而轻论文，则该体系的知识利用机制是落后的。总之,一个学科的研究者以期刊还是以专著为主要文献信息源，反映了该学科研究者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时间距离的长短，这同时也是知识增长速度的一个指标。

——文献“半衰期”是反映文献老化的一个指标,一个学科的文献“半衰期”指标是该学科文献失去一半使用价值所经历的时间。文献老化有许多原因，如文献中的知识出现在其他文献中,因替代品的出现导致文献老化。但文献老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学科知识的老化。因此,从交流领域获取的文献“半衰期”指标可以作为学科知识老化或学科知识更新速度的指标。在几乎所有学者的研究中,社会科学文献的“半衰期”指标均要大于自然科学,于是人们根据这一事实,断言自然科学发展速度快于社会科学。尽管有人列举许多理由为社会科学文献的“半衰期”较长进行辩护,如认为社会科学需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即需要进行历史研究等等,但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速度远远快于自然界，以人类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的更新速度没有理由慢于自然科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果说科学大厦是由科学家们一砖一瓦建筑而成的，那么独创性科研成果就是科学大厦的唯一“砌件”。产生独创性科研成果的前提是实现继承性研究，严格避免重复劳动。要做到这些，并接受他人对该研究的检验，科学文献的引文或参考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当科学家遵循同一科学伦理准则时，引文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进行该研究时继承前人研究的情况。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科学文献的平均引文数量少于自然科学。从引文质量看，社会科学引文中学术性引用少，而装饰性引用多。社会科学中十分普遍的情况是，小人物引大人物的文章，大人物引“老祖宗”的文章，以经典著作家的论点或语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非将他人观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这种引文量少或装饰性引用的现象，说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没有自觉进行独创性研究，其成果也往往难以成为科学大厦的理论“砌件”。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开始发生变革，社会科学的交流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特别是一批发展迅速的面向应用的社会科学学科，其交流特征出现了接近自然科学交流特征的变化。仍以上面提到过的两个指标“论文／专著比”、“半衰期”为例，人们发现，现代社会科学的“论文／专著比”中论文的比重逐渐在增大；“半衰期”在缩短。而在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社会科学中，一批面向应用、初步具备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其指标更加接近自然科学。这些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使用交流指标来研究社会科学的科学学问题是完全可行的。

研究社会科学交流机制能够说明社会科学家在其利用科学信息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因此，社会科学界和社会科学信息界最初对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研究，其目的主要是帮助社会科学信息服务部门改进信息服务。在西方，早期的社会科学信息服务系

统一般是模仿科技信息服务系统建立起来的，这种系统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社会科学家对信息服务的特殊要求。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意识到原有信息系统不能适应社会科学家信息需要的特殊性，认识到有必要针对社会科学家的特殊信息需求改进信息服务。于是，由一些社会科学团体或基金支持，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调查与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美国经济学协会、英国巴思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等部门对特定学科的社会科学交流问题进行过大量的实证性研究。这批研究的主要结论对改进和完善当时的社会科学信息服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研究社会科学交流机制还能够帮助解决社会科学管理领域的问题。8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社会科学信息系统建设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因而研究社会科学交流机制问题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人们通过社会科学交流指标，分析社会科学的变化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许多改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主张。例如，当年主持过巴思大学‘社会科学信息系统设计’和‘社会科学信息需求调查’两大研究项目的布里顿，70 年代后期以来连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对社会科学交流指标的分析，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落后的知识积累方式、研究方法、成果检验方法等进行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这些研究，为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加强对社会科学的管理提供了理论方面的依据。

第三节　定量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交流机制

1978 年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朝着现代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与变革，取得了明显的理论进步。对于社会科学理

论发展与变革成就，社会科学界一直在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总结。从 80 年代中期起，不断有人从总体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学问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七五’重点项目设有‘社会科学学与社会科学管理研究’的研究课题,出版了夏禹龙主编的《社会科学学》等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大量研究较好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

但是,以往的研究偏重定性分析,而不能自觉运用社会科学统计数据说明问题。从科学学的一般方法论看,对科学变革趋势的精确描述和分析不仅需要推理和事实，还需要科学计量学指标。科学计量指标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科学研究经费、科学家人数等科学管理指标,也包括科学交流指标。科学交流指标取自科学研究的最终产品——科学文献，其在科学学研究中的地位是其他指标无法取代的。

从 80 年代起，我国学者从社会科学学和社会科学信息工作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科学交流机制问题,并取得一批成果。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更是将社会科学交流问题作为该项目的核心部分加以研究，并得到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从已有研究情况看,我国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研究有两个特点 第一,比较注重对国外社会科学交流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研究。多年来,我国翻译、介绍和研究过 60 年代以来国外进行的多项重大社会科学交流调研项目，特别是英国巴思大学的莱恩、布里顿等人主持的“社会科学信息需求调查”(INFROSS)和“社会科学信息系统设计”(DISSIS)等大型调研项目,同时还翻译和介绍了许多有关社会科学交流的研究论著。通过介绍和研究，人们了解了在社会科学中使用科学交流指标的方法，了解了传统社会科学的交流特点及当代社会科学变革对

科学交流领域产生的影响。通过中外比较研究,初步研究了我国社会科学交流机制问题。第二,对某些学科的文献或某些用户群进行调查,通过调研数据,分析社会科学用户需要和信息服务问题。这种研究是基础性的,得到的数据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但我国过去进行的此类研究,一般规模不大,或限于少数几个小学科,或限于个别部门 或虽有一定的调查面,但由于问卷的回收率太低,结论可信度很低。

研究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前提是通过系统的方法获取交流数据。只有通过相当规模的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调研,得到了可信的数据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交流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并通过此类研究揭示中国社会科学发生的变革。

描述科学变化趋势的指标有很多,例如科学家人数、科学研究经费、科学研究成果数等。在自然科学中,上述指标都是十分明确的,可以通过常规统计方法获取。与自然科学相比,在社会科学中使用上述指标有一定困难。例如:

1. 科学家人数。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构成远比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复杂。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职业特点明显,国家统计资料均能明白无误地反映其构成。而社会科学则不同,许多社会工作者,如政治家、律师、教师、记者,甚至某些体力劳动人员,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因此,我们很难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确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变化情况,科学家人数变化这一反映科学进步的指标也难以使用。

2. 科学研究经费。现代自然科学对研究经费要求较高,经费投入指标往往能较正确地反映科学研究能力的情况。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对资金的要求则有相当大的弹性,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是在没有经费资助的情况下从事着社会科学研究。因此,科学研究经费这一指标也很难反映社会科学的变化情况。

因此，在以往的社会科学学研究中，人们很少用科学家人数、经费等科学学常用指标描述社会科学的变化。

相对而言，用科学成果数量指标更能准确反映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情况。论文、专著、学位论文和研究报告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产品，成果数量的变化趋势能够反映社会科学研究‘产出’量的变化趋势。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产量这种数量指标只有与质量指标相结合，才能真正反映社会科学的变化，但数量指标的统计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若达到一定的统计量，则可以将质量方面的差异视为随机误差而忽略了。

在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形式中，报刊文献是数量最大、生产周期最短的一种形式。在科学交流体系完善的现代社会科学中，报刊论文也是社会科学创造性研究成果的最主要载体。因此，报刊文献这一数量指标是描述社会科学研究‘产出’情况的最重要的指标。

要通过来自交流领域的数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繁荣、变革与有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对社会科学交流产品进行一定规模的统计分析。期刊论文是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最主要载体，科学交流数据的统计重点应该是期刊论文。在社会科学领域，报纸是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又一载体。因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交流问题首先必须对社会科学报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然而，系统的分析有许多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表的社会科学报刊文献以百万计，作者（含译文的作者）数十万人，报刊（含已停办或改名的报刊）数千种。对如此大量的文献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不但手工编码的统计方式不可能做到，即使利用已有印刷型文献数据库（如书本式索引《全国报刊索引》）辅助手工统计，也很难达到多角度统计分析对数据的要求。由于存在这些困难，我国一直没有开展大规模社会科学报刊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大型中文报刊文献机读数据库终于出现,并以商品形式公开发行。此类数据库虽然本身没有统计功能，但它为研究者通过编制特定的计算机程序进行统计与分析提供了信息源。因特网的迅速发展既导致新的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的产生，也更加方便了研究者对国外社会科学文献的统计与获取。外部条件的这些变化,使得对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进行大面积统计研究的条件已初步成熟。

1996 年，我们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因而有条件对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献进行较大规模的统计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成果,以国内大型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的光盘版为主要信息源，辅以对国内其他印刷型检索工具的手工统计，对国际社会科学文献作联机检索、光盘检索和 Internet 查寻，获得大量可以反映 70 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社会科学交流状况的资料。通过对上百万条记录的统计、技术处理和分析,整理出一批能够定量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与现状的基本数据。对社会科学文献进行如此规模的统计与分析,不但在国内尚属首次,在国外也不多见。

通过对各种信息源中获取的文献数据的统计与分析，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变革的基本面貌渐渐凸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的世所罕见的增长趋势,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价值观念改变而导致的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科学及各主要一级学科极有帮助的交流指标。我们得以从报刊文献计量指标这样一个可比较的方面,在与世界社会科学的比较中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在与整个社会科学或其他学科的比较中观察某个社会科学子学科。大量统计分析的结论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印证,这也证明了定量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可行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